

乱世枭雄多诡术

—— 蒋介石

点评：

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毕生热衷于权力，为达个人目的，他丧心病狂，几度易妻；他投机钻营，干上了黄埔军校校长之美差，俨然每每以校长自居，为其日后飞黄腾达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蒋介石的政治发迹，主要是靠山、机遇、才干和手腕。

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将厚黑学运用得最为极至的权谋家。

他笃信“政治的灵魂在权谋”，在军事斗争尚未开始时，就从政治上作全面的考虑，千方百计分化瓦解对手，这种政治上的诡术，远远高于其军事进攻。在国民党内部，凡是与他争斗的人，往往不经意间就成了光杆司令。他先后斗败了许崇智、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欺骗了张学良，除掉了韩复榘，降服了孙殿英，算计了白崇禧，赶走了史迪威，可谓成果辉煌，风光无限。

纵观蒋介石的兴衰史，一生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怕毛泽东；二怕和老外打仗；第三个特点是国民党内部窝里斗。

李宗仁先生曾说：“蒋介石统兵治政的本领极端低下，但其使用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斯言极是。

劣根未除小顽童

蒋介石，乳名瑞元，学名志清，谱名周泰，后改名中正，字介石。生于 1887 年 10 月 31 日，籍贯是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

蒋介石少年时期很顽皮好动，淘气性劣。三岁时，竟好奇地用筷子插进自己的食管，以至于疼得晕过去。五岁时，向结冰的缸中捞冰，亦说于水缸中捞月，倒栽缸中，等被人发现后，已奄奄待毙。上学以后顽梗更甚。蒋自己谓“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并经常挨母亲的捶打。七岁时有一次随祖父到法华寺拜佛，从陡坡上向下急奔，被摔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更常在溪中玩水，雨后水涨，蒋也照样跳入水中，有好几次几乎被淹死。与同伴游戏时，也常做恶作剧吓人，有一次夜里，竟装扮成鬼，把同伴吓倒在地。更多地是自充群儿之首，舞刀弄棒，带兵打仗，并带头拚战，因之镇中儿童多畏惧他，但亦乐于跟他玩耍。亦常被人称为“瑞元无赖”。他也一直盛气凌人。他母亲，正像蒋自己所说，对他严加管教，常常打他，有时甚至大加鞭撻，亦不见效，其母常为之悲泣。有一次被母亲关在房里痛打，他无奈之下，就钻进床底下不出来；恰有邻人来访，蒋即乘其母开门之时，从床下爬出，急奔而逃，蒋母追之不及，气得嚎啕大哭。稍长，每年元宵节，蒋都带头领队盘龙，非常积极。有一次带队到岳丈岩头村“盘龙”，要岳丈村子摆酒席相待，但村人表示冷淡，岳丈家则认为他顽梗不规，甚不成器，很不高兴。岳父毛鼎和则更加不喜欢他，以后两人关系也始终不好。

他有时也打抱不平，八岁时，为正义感驱使，将一个欺负幼

小同学的蛮横同学打倒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老师闻讯斥责他，他也不声响，不申辩。总之他很难服管教。“他对生母的责打，视若寻常，依旧我行我素”，并且常对小伙伴们说，要做“没有人管的大官”。

蒋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动静相差极为悬殊。当他下课休息时，在教室里奔跑不停，并不断和同学开玩笑，如果心血来潮，就大搞恶作剧捉弄同学；而一旦开始用功，却又专心致志，不管环境多乱，多么吵闹，他照样埋头读书或奋笔疾书，毫不受影响。就是说，一刹那间，动静判若两人。另一个特点，就是能独立思考，曾传留有这样一个故事，私塾里面挂有一个匾额“冰清玉洁”，蒋对这四个字有自己的“创见”，他解释为即使在乱哄哄的环境中，只要一心想求学问，就一定能够做到。此解虽不甚准确，但足见其好动脑子和有意志。蒋下学后，也在家帮母亲操劳家务，如烧饭、剪桑、理床等杂务，无不为之。蒋幼年，体弱多病，赖其祖父玉表公为其诊治调养，身体日见好转和健康。

1899年，蒋介石13岁，这一年，有一外乡看相人，见蒋头部不一般，常到其家摸其头脑，并自言自语曰：“我未见到如此骨相，此孩子殊奇特。”如是者二三次，后不复再来。以后蒋母常以此作为话柄，谈及此事。

蒋介石14岁时，他对青梅竹马的堂表妹毛阿春产生了浓厚的恋情，每当学馆放假他就到岩头村堂姑蒋赛凤（丈夫毛凤扬，已死）家去探望阿春。蒋既钟情于她，不免对要好的同学陈远离（陈伯泉孙子，称蒋介石为表叔）常常提起毛阿春。有一次陈远离就打趣蒋氏说：“阿元叔，你对阿春这样好，干脆娶来当老婆算了。”而蒋氏却也不怕，竟毫不掩饰地说：“娶老婆要有媒人啊，你会做媒吗？”这一场打趣之后，“瑞元要讨阿春做老婆”

的新闻，便不胫而走，传到了蒋母耳里，也传到了阿春家。蒋母为此特别害怕人家对她说长道短，倒是蒋氏的外祖母，给蒋母拿了大主意，她叫女儿干脆找去向阿春娘提亲，把阿春娶过来，使这匹小野马套上笼头，也就好了。蒋母一想有道理，就托媒人去阿春家说媒。

但阿春之母却正因此事，正在家中等待瑞元再来登门时，大大发作一次，将蒋逐出。正在此时，蒋母托的媒人就撞进来了。蒋赛凤一见媒人，就破口大骂：“阿嫂也真作孽，这样不大争气的歪胚，不好好管教，还对他依头顺脑，来提亲，将来变成败家子，有得哭呢！我有十个女儿也不会嫁给他，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媒人着实地碰了一鼻子灰，没好气地回报了蒋母。蒋母不听倒还罢了，一听真是又气又羞，窘得无地自容，于是她发狠地说：“赛凤把我家阿元看作虫，我一定要在她眼皮底下挑个好媳妇。”刚强不屈的蒋母，说干就干，马上雇了一顶小轿，赶到岩头村，找表兄陈伯泉，拜托他无论如何要给瑞元在岩头村找个好媳妇。陈因情面难却，就答应了，但又觉得此事颇有难处，便硬着头皮，拿着老脸去碰运气。

毛阿春长得非常出色，可以说百里挑一，要在本村找一个比她好的姑娘，实非易事。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和比较，陈氏终于找到了毛鼎和的女儿毛馥梅，后改为福美，多称福梅。毛鼎和看重乡中名人陈伯泉的身份，觉得他说媒面子上光彩，而蒋父肇聪又是乡中绅士，瑞元也聪明过人，读书学业均佳，大有成为秀才、举人之望，所以经陈氏一说，毛鼎和就有九分愿意了。再经了解，镇上人均称赞蒋母贤德，教子有方，瑞元也很孝顺，于是就很快定了亲事。

1901年，蒋15岁，与岩头毛鼎和之女福梅结婚，举行婚礼

的当天，蒋仍是和村童玩耍，拜完天地后，就将红缨帽扔到地上，和村童去放爆竹，然后又到处玩耍，将新娘丢在一边，直到晚上仍不回家入洞房，急得蒋母只是哭泣。蒋闻知后，才赶快奔回家中，跪于母前，听候发落。并遵母命入洞房坐床、撒帐、喝交杯酒，吃相量盏。但作完这一切后，他又跑回母房，不与新娘同住，其母又命人半拉半拖地将蒋按放在新娘床上，而蒋却合着双眼酣睡，一夜未醒，不知是真睡，还是假装。

蒋结婚后，同居时间不多，因为蒋那时还时常努力学习，不是远走乡邻，就是奔走他乡，所以毛氏仅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即蒋经国。

对于少年时代的顽皮好动，蒋自己后来也常提及幼年的淘气，可见他少年时的非同一般的性劣。

辣手起家同流污

蒋介石登上政治舞台，缺少不了江浙财团们的扶助。而真正表现出色是在 1922 年 6 月陈炯明叛乱后，他大力对江浙财团的信誓旦旦的许诺。那时蒋介石赴粤，以后一直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蒋介石被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以后为蒋的智囊张静江被蒋所邀赴广州。当时，张静江体弱多病，但为了蒋介石进一步抓权植势，排除异己，巩固其地位，仍然赴广州积极参与政界的活动。在《中国的全貌》一书上这样写道：张静江“在民国十五年蒋介石在广东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和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时，应蒋邀请到广东，为了蒋介石而和各派系调停，并筹措军费，参与机密工作，成为蒋的智囊，

并在举行北伐战争时从内部作了很大的努力”。1926年1月，张静江为了改善蒋介石同汪精卫的矛盾，亲自邀蒋和汪精卫夫妇同游黄埔风景区。国民党二大决定建立中央政治会议后，张静江担任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以姻亲周觉为中政会秘书长，事事听蒋介石的，以蒋介石的意见为意见，甘心为蒋所用。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张静江以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的身份留守广州。当时张的父亲去世，张应蒋介石之请，取消回原籍奔丧的计划，于1926年12月中旬到了蒋介石在南昌的临时总司令部，参与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的阴谋活动。

蒋介石南下广州，站稳脚跟后，在1926年出师北伐。为了争取江浙财团的资助与支持，曾由宋子文等电邀虞洽卿等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上海总商会原推定王晓籁、劳敬修、陈良玉、陈炳谦等人为赴粤代表，但因当时上海仍然处在孙传芳的势力下，大家有所顾虑，借口事冗辞却。后来，王晓籁改变主意，愿意赴粤，虞洽卿遂推荐女婿盛冠中陪同王启程赴粤。虞洽卿之所以推荐盛去，是因为看到蒋介石在广东飞黄腾达，声势煊赫，但不知还买不买过去在交易所助其一臂之力的账，所以派女婿去试探一下虚实。王晓籁等到广州后分头拜访旧友，颇受款待，交谊如昔，知国民政府即将北伐，正合心意，并参加了7月9日的北伐誓师典礼，直到北伐出师后，才返沪。虞从盛之口，知道了蒋介石很讲交情，并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于是就更加卖力地帮助蒋介石。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虞洽卿便亲自赶往南昌拜会蒋介石。虞自南昌了解蒋的意图回沪后，就与江浙财团的一部分人，以所谓“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的目的，撇开与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1927年12月22日另行组织了包括上海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纱厂联合会等六

十多个团体的上海商业联合会。虞就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名义，把江浙财团要寻找的新靠山的宝全押在蒋介石的身上。

当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相当大。据估计，1927年的春夏两季，他的军事开支平均每月为两千万元。这笔钱，蒋介石就靠江浙财团的资助。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部自九江进驻上海。“蒋一到达这座城市，便与虞洽卿和其他商界头面人物会面，以便获得他同武汉决裂所需的财政援助。资本家们组织起来支持蒋”。26日当晚，虞洽卿就立即去拜访蒋介石，商量组织替蒋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问题。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专门召开会议，听取虞洽卿拜见蒋介石的情况报告。虞说：“蒋已拟就宣言，即日起可宣布。蒋对政治决取公开主义。闻拟延聘财政与外交委员数位，大约将于南北商会、银钱业两公会中遴选任用。昨晚已有数机关由白总指挥代委，大多数为宁波人。鄙人当时主张尽外省人先用，蒋颇赞成。”又说：“蒋对本会宗旨极赞同。”在听取虞的报告之后，会上又推出吴蕴斋、谢韬甫、荣宗敬、陆伯鸿、吴麟书、劳敬修、闻兰亭、叶扶霄、顾馨一等九人，后又增添了几人，准备去同蒋介石具体商谈以财政支持蒋同共产党决裂的条件。29日，这伙人“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银行公会会长吴蕴斋起立“陈述商界全体欢迎”，“希望蒋氏对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纱业公会穆藕初述：“劳资如昆季，当有精神上之联合，并以发展商业要点，在关税自主与取消厘金两端。”蒋答词谓：“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有武汉态度。”接着，蒋介石就分别致函上海商业联合会和上海银行公会，说他已派财政委员专程同这两个会商定关于借款的事。函中说：“现在军事未已，庶政繁兴。目前应用急需款项，

亟应首先筹垫。”

江浙财团同蒋介石谈妥条件之后，就一笔又一笔地拿巨款给蒋介石使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就拿到这么几笔钱：第一笔是4月1日，上海市金融业资本家先向蒋垫付了三百万元。这是3月29日商界代表见蒋时认捐的五百万元中的一部分，当时《时报》有一个报导，说商界代表“认捐五百万元，即继续输将，亦商界所愿，借款可以另案办理”。这三百万元由两家分摊，银行公会二百万元，钱业公会一百万元。这一笔钱是直接资助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二笔是4月15日，上海市银钱业又垫付了三百万元。这是第一笔钱垫付后几天，蒋介石接二连三地发电报致陈光甫，陈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头头，当时又是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主任，所以蒋介石打电报给他，要他转向虞洽卿暨商业联合会催拨3月29日认捐的五百万元，并请金融业继续筹饷。上海银行公会就向蒋介石提出要国民政府明文规定维护金融方针和承认并偿还北洋政府旧债的条件。蒋介石满口答应，只要有钱给他就行，不仅宋子文表示全部接受上海银行公会提出的条件，而且蒋介石还以总司令的名义下令江、浙、皖、闽、粤各省军政当局，切实保护各地银行钱庄。第三笔是4月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又垫付了一千万元。事情起因还是3月29日的认捐上海商业联合会“迄今未缴分文”，蒋介石又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垫款。上海分行头头张嘉璈怕蒋介石不断需索会取空银行发行准备，一时未允垫付。后陈光甫暗示张嘉璈，蒋介石准备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而且这个条例国民政府已经通过，垫款有偿还的保证。这样，张才借款一千万元给蒋。第四笔是5月1日，江浙财团的资本家又认购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三千万元。当时蒋介石以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行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三千万

元，全数在江浙财团的资本家中摊派：上海银钱业认购了五百万元，上海商业联合会认购了三百万元，江浙两省认购了一千二百万元，绅富认购七百万元，两淮盐商认购三百万。也有的说，这三千万元是国民党财政部公布发行月息七厘的短期库券：上海钱业公会在会钱庄认购一百六十万元，闸北水电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华南保险公司认购五十万元，内地自来水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南市电气公司认购三十万元，先施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南洋烟草公司认购五十万元，粤侨商业联合会认购三十万元，商务印书馆认购二十万元，永安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新新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华成烟草公司认购十万元，丝茧总公所认购十万元。第五笔是这一年的 10 月（二千四百万）和 1928 年初（一千六百万）蒋介石又先后两次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四千万元。

这一笔又一笔索取和摊派，江浙财团的资本家虽然有不满的情绪，甚至出现抵触和不愿承购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支持蒋介石，为蒋介石提供了资助。不仅如此，他们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表示明确的支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于 15 日将到达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召拢来，企图开二届四中全会，结果未开成，只开了一个“谈话会”。这时，上海商业联合会 16 日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请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窃维革命告成，建设附之。不图共产党祇知破坏，阴谋暴露，事实俱在。幸当局未雨绸缪，俾免赤祸蔓延，此商民所感慰者也。顷读吴稚晖先生呈请清党电文，盖见当有扫荡反动之决心。诸公此次列席会议，解决国是，在兹一举，可否之间，关系甚巨。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同日，上海钱业公会也给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打

了电报，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之惟一政策，是以旌旗所至，靡不箪壶欢迎。乃不幸有捣乱分子，假党之名，窃党之权，欲试其倒行逆施之手段，为此反革命行为，全国人民视为公敌。伏乞诸公此次列席，毅力解决，扫除毒氛，锄暴安良，在此一举。凡我人民愿作后盾。”¹⁷日，上海银行公会也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请转国民党执、监委员会，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自革命军奠定淞沪，商贾方期安居乐业。不图少数暴烈分子遽施破坏，扰乱大局，其叛党祸国，人民共愤。闻诸公此次列席会议，具有驱赤毅力，清党决心。树立国本，端在斯举，商业金融，实利赖之。”

临危智救孙中山

蒋介石是怎样认识孙中山的呢？又是怎样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呢？这就要谈到一个中介人物陈其美。

陈其美是浙江吴兴人，兄弟三个，他是老二，老大陈其业，老三陈其采。陈其美是 1906 年赴日本留学的。这一年“夏，偕徐谦、谢持等东渡，入东京警监学校，旋转入东斌陆军学校习军事学”。前面已经说及蒋介石是 1907 年赴日本留学的，当蒋在日本求学时，陈其美对蒋是“一见如故，即与订交，介绍入同盟会”，并且引蒋介石见了孙中山。

陈其美同孙中山的关系是很深的，陈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蒋介石又一直追随陈其美活动。

陈其美是中部同盟会的骨干之一。他也是江浙财阀的一员，

又是上海流氓组织的一个重要角色，个人野心很大。辛亥革命时，陶成章和光复会的人们在江浙一带起义，为革命建立了许多功劳。11月3日陈其美在上海也组织队伍，进攻制造局，被清军逮捕锁在制造局内。第二天，李燮和率领光复会和同盟会的起义军攻下制造局，救出了陈其美。李燮和以司令部长行都督事，出示安民。6日开会组织上海军政府，李燮和抱病未出席，陈其美就乘机自称上海都督。李燮和乃避往吴淞口自称都督，宣布吴淞军政分府隶属武昌，不受上海节制。蒋介石从日本回国，10月30日（阴历九月初九日）到达上海。11月3日（阴历九月十三日）上海起义，次夜杭州起义。蒋介石是否参加过杭州起义，存疑待证。但蒋家官书所说，阴历九月上旬陈其美派蒋介石到杭州运动新军起义，绝不可能；蒋介石在《复颜乃斌书》里自称，他在杭州起义时任先锋队指挥官，更是吹牛。当时蒋介石投靠陈其美当了一名团长，确是事实，他的顶头上司，师长是黄郛，旅长是张宗昌。说起来，团长官也不算小了。可是在“杨梅都督”（陈其美的外号）帐下，将军多如牛毛，连共舞台的演员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弟兄都是少将军衔，蒋介石那样的起码团长，从哪里数也数不到他。

且莫说蒋介石团长毫无地位，他却在辛亥革命史中留下了姓名。光复会首领陶成章，是陈其美集团的眼中钉。陈其美觉得这一“祸害”不予根除，当不成杨梅都督，打劫不到革命果实，于是派蒋介石先除陶成章。当时陶成章因病住在法租界广慈医院，夜间蒋介石闯入医院，用手枪把他刺杀了。据马叙伦说：“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二百元，怀手枪一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介石，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颌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

次晨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

1912年1月14日陶成章被暗杀。孙中山先生在南京闻讯后，非常气愤，15日致电陈其美：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革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犯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

孙中山先生不知凶犯是谁。陈其美当然不敢自承，更不能“严速究缉”，只是悄悄地打发蒋介石离开上海。这在蒋家官书上写做“1912年春，因“陶案之故，乃避往日本”。

1915年2月，陈其美从日本返沪进行反袁活动，将蒋介石留在东京处理善后。在《陈英士年谱》中说：“二月，由日本返沪主持讨袁军事，留蒋公在东京处理未了之事。公送至横滨轮次，慰之曰：‘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氏所害，余当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这一年10月，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在上海组织反袁军事活动，陈又将蒋从日本召回上海参与反袁活动。当时，蒋介石在淞沪司令长官总机关任机务，不仅“作战计划，由蒋公手订”，而且“先生偕蒋公并亲临南市工程总局督战”。蒋介石参加运动肇和舰、袭取应瑞舰、攻夺陆地各官署的军事活动。

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期间追随陈其美活动，直至1916年5日陈在沪被袁世凯派人所害。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就设法全力投靠孙中山，来获取孙中山的信任。当时，孙中山在搞“联甲倒乙”的继续革命。辛亥革命

失败后，孙中山继续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主张武装斗争，但找不到正确的道路，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革命力量，所以在以后十多年的军事斗争中，孙中山采取了联合甲派军事力量打倒乙派军事力量的军事政策，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成败也就不得不取决于某派军队对他的拥护或反对了。就是在孙中山搞“联甲倒乙”而一再碰壁的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与提拔。

袁世凯死后，北京段祺瑞政府非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南下广州搞护法斗争，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1917年9月20日，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认为：“北方政府所辖之军队，约在三十万以上，然实际上可为其动员者，即以冯、段二派势力合计，则其数亦不过六万……我军乃在十师以上，其总员几倍于敌军各师之兵数，或者不足，虽折减至二成，则亦多于敌军三分之一也。至于实力之比较，惟战用器材不及敌军外，其余如给养力、人马之战斗力，不甚上下也。而敌军南来，其地势不宜，气候不惯，则南军较胜一筹也。”鉴于这种分析，蒋介石又提出：“吾军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决定南京，击破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以为作战之方针”，并认为作战计划分为二期：第一期“中央军由两粤进击长沙，肃清湖南全境，待左翼军解决四川、东下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左翼军解决四川后，当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制秦、晋之敌军，使第二期作战北伐时，即可道出秦、晋，与本军互相策应，而其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右翼军与海军共同协作，合攻闽、浙，连下淞沪，待中央军与左翼军克复武昌，然后与之合师南京，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海军与右翼军占领淞沪时，即以吴淞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扫除长江下游之敌舰，声援上游陆军之作战，待各军会师南京时，与之合力攻城，同时搜捕长江舰队，俾第二期作战时海上

全权归于我有，不使其复为东北海岸之患也”。第二期“作战运动开始，乃在明年之三月间也。各军进发之道，以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右翼军由海道前进，在辽西登陆。三军分道并进，而左翼军之一支队则由川北而出秦、晋，以袭敌军之左，为本军之声援。各军会师燕京，为总攻击最后之准备也”。同年 10 月 1 日，蒋介石又写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认为：“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淞沪之敌军。以吴淞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入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1918 年春，蒋介石南下广东，参与孙中山的军事活动。先后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官。在 3 月 10 日，他给孙中山呈上一份《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7 月 9 日又呈上一份《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在粤军中，由于蒋介石同陈炯明有矛盾，几度辞去军职。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尤其在军事上对蒋的信任，已逐渐超过朱执信。1920 年 9 月 21 日朱执信不幸遇难，孙中山于 10 月 29 日给蒋介石去过一信，说：“执信忽然殁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这一年 12 月间，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并决定西征。在此前后，数次电催蒋介石赴粤。11 月 15 日，孙中山及张人杰、戴传贤、胡汉民合电蒋介石。16 日孙中山又单独给蒋介石去电。1921 年 1 月 10 日，蒋介石在奉化拟就了一份

军事意见书邮呈孙中山，对于时局之意见，对于军事准备之意见，对于北方出师准备之意见，对于处置四川之意见，军费之预算，对于军制之意见，关于外交之意见，对于兵工厂之筹备和对于粤汉铁路之建筑等九个方面都提供了意见。12日，孙中山给蒋去电说：“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延迟为幸，盼复！”3月5日，蒋介石自奉化邮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29日，孙中山去电蒋介石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军事筹划，兄来更速进行 幸即趣装！”4月8日和21日，孙又去电蒋介石催其南下。7月20日、11月9日和12月23日孙又去电蒋介石说：“速来相助”，“节哀速来，臂助一切”，“一切仍俟兄来商榷”。1922年5月6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但广州形势危急，陈炯明正策划叛变。6月2日，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扶持危局说：“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17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率海军和叛军对抗；在英帝国主义和军阀陈炯明等包围之中，处境极为困难。6月29日蒋介石从上海到达广州，到永丰舰上为孙中山作随从。孙中山不知蒋介石离沪的底细，止看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自然对蒋介石寄以信任。八月中旬，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九月间，蒋介石又写出《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歌颂孙中山，痛斥陈炯明。更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于是亲为作《序》。这样就提高了蒋介石的地位。10月间，孙中山把在福建的部队编为东路讨贼军，任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蒋介石干了一个多月就不干了。1923年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元帅

府，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4月中蒋介石才由沪到粤任职。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孙中山找到了革命的新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俄国共产党的帮助。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3年1月23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陈独秀等二十一人为中国国民党的参议。26日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苏俄代表越飞重申，1920年9月27日苏俄对华宣言所列举的原则，“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随后，孙中山聘请苏联顾问到中国（鲍罗廷为国民党顾问），并派遣“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去考察学习。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是蒋介石，团员是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8月16日从上海启程，9月2日到达莫斯科，11月29日离莫斯科回国。蒋介石在莫斯科住了三个月，没有见到正在病中的列宁，也没有见过斯大林，也没有考察和学习革命事迹与革命理论。却五次“步入不寂之园。其地距莫京最高处，极西为麻雀山，相传拿破仑驻军于此”。蒋介石在那里，模仿着拿破仑的姿态昂首四瞻。11月27日面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对他说：“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以此为临别赠言。”蒋介石把它做为成功立业的要素。革命力量大的时候，他就“忍耐”；有机可乘时，他就大肆搞反革命的“活动”，以求“成功立业”当一个反革命的大头目。

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写了一个考察报告（此文从未见过）。1924年1月16日到广州向孙中山先生复命。蒋介石出国

百日，虽然不曾学到革命理论，到底还是学到了一些革命词句。他讲话时，满口“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还说：“总要打破外国帝国主义横暴野蛮的势力，方才可以说是革命彻底成功。”

“中国革命，不是中国一国的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要联合世界各国的革命党，来促进中国革命的成功。”他迷惑了许多人，也骗得了孙中山的更加信任。所以 1924 年 1 月 24 日孙中山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 月 3 日又任命他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蒋介石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是多方面的因素所导成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蒋介石本身的才能，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才能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使孙中山找到了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中一个关键的事实是陈炯明的叛变，想置孙中山于死地，此时蒋介石能毅然决定南下广州潜入永丰舰，帮助孙中山渡过难关，这不能不使孙中山感动，更加信赖蒋介石。难怪孙中山把自己同蒋介石的关系说成是“如身之臂，如骖之靳”，可见非同一般。

亲苏拥共显风采

1930 年 4 月 7 日《大公报》上有关对蒋介石评述的一句话：“论者谓：好话为先生说尽，而坏事为先生做尽。”此话在蒋介石上台阶段是前半句。

在当时，蒋介石说了一些什么话呢？将他在广东的讲话加以归纳，可分为三大类：

一是“赞同”共产主义，“仿效”苏联，“拥护”共产党。